

本 辑 目 录

- 1、王右木烈士的女儿王松英回忆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记录整理(1)
- 2、江油六合堰水利工程概况.....刘叔思、唐厚安(14)
- 3、解放前江油海棠铺钻探石油概况.....彭泽富(24)
- 4、海灯法师.....肖定沛(29)
- 5、江油方水乡的生姜.....邹本全、高明山(41)
- 6、江油“老天干”纪实.....刘维荣(46)
- 7、解放前中坝“涪沅公司”.....张维同(49)
- 8、一九四六年江油鸦片烟案.....姚叔平、王锡加(54)
- 9、一九四四年江油复兴烟纪实.....高明山、邹本全(67)
- 10、解放前江油八一乡袍哥罪恶活动简介.....高明山、邹本全(67)

一九八四年五月卅一日

王右木烈士的女儿王松英

回忆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在县政协召开的文史资料座谈会上，有一位头发花白，身体微胖，脸色红润，精神健旺的老太太的发言，吸引了全体与会者。她就是中共四川省党组织的早期创始人王右木烈士的女儿王松英同志。

王松英同志生于一九一一年，今年满七十三岁。她从八岁起就跟随父亲离乡背井，为革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她十三岁时，就再见到父亲的面。王右木烈士的高大形象和他为革命所从事的活动，给女儿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追忆往事，王松英同志百感交集，她愿将父亲的革命事迹留传后世，为祖国留下一份珍贵的革命史料。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我会文史资料组的同志前往武都镇王右木烈士的故居——王聚老房子访问了王松英同志，瞻仰了烈士和烈士亲属的遗像。现将王松英同志口述的情况整理出来，供研究参考。

父亲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于江油武都镇一个贫民家庭。他们一共三弟兄。大伯王寿昌，二伯王荣昌，父亲排行第三，名王丕昌，读书后自己取名王丕，王右木。

父亲一九一三年毕业于成都高等师范学堂。一九一四年考上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经济系中国官费生，由亲友资助到日本留学。在日本留学时，经常听到日本进步学者山川菊夫妇和上杉荣讲授经济学，还听

过京都帝国大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向上~~掌~~游《政治经济学史》。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父亲在日本参加了李大钊同志在中国留学生中组织的“神州学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真理。一九一八年秋，父亲就明治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住了几个月，于一九一九年春回到四川江油武都老家。

父亲留学回来后，大伯要他竞选省参议员，父亲早已立志献身无产阶级事业，坚决不参加竞选。在这^是大非问题上，兄弟间吵得不可调和。大伯父非常气恼，决定与父亲分家。共分给父亲三百个银元，只给了二百五十个，伯父说，留下五十个银元给父亲收尸。一九一九年端午节父亲就带上妈妈、二弟和我一同到成都。当时我刚八岁，我们对他无疑是个拖累，但家中还留下大弟弟，如果再把我们留下是不可能的。

离开老家后，家里人遭到反动派的迫害。大伯父被关押了一个月。二伯父在关押中严刑拷打致死。我们在成都住定后，只得把大弟弟也接到了成都。

我们初到成都，住在实业街，父亲的公开身份是高师学监（即训育主任）。在这个学校教经济学、日文，还在政法专门学校、成都女子师范学校、高师附中兼课。张秀熟同志当时就任高师附中秘书，是父亲的学生。

父亲在几处任课，每月的工资大约有一百多元，但很难领到工资，

就是领到全薪。家庭开支也只准用十多元。其余的钱用来买书办报。在成都母亲又生了妹妹。全家六口。母亲是小脚。信佛教。少出门。一家人的生活由我操办。我才十来岁。就象大人一样操持家务。还要上学。够劳累的了。

在实业街住了不久。我家又搬往大红土地庙街六坝巷五号。在这儿住的时间较长。记得家里厨房很大。父亲他们在厨房开会或碰头。我常在外面踢毽子玩。有人来找父亲。我若认得就先进屋去通报。父亲同意接见。再领进屋；若来的是生人。我就拉大嗓门喊：“晓得父亲到哪里去了啊！”这样。使父亲听见。又搪塞了来的陌生人。

父亲的革命事迹我不完全知道。就我现在所说这些。有些是我亲历亲见的。有的是听父亲的同志讲的。这些也仅仅是他全部活动的一部份。父亲一九二〇年在成都组织进步青年成立“马克思主义读书会”；一九二一年一月创办了四川最早的马列主义刊物《新四川旬刊》；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在成都组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一九二二年二月创办《人声报》；一九二三年组织建立“成都劳动联合会”；同年秋。创立“中共四川支部”。

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领导“教育经费独立运动”这件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而且还常被挪作它用。学校经常只给教职员工发一部份工资。教师生活十分清苦。学校设备简陋。直接影响到教学质量。广大师生对这一现状怀着极大的义忿。一九二〇年。

父亲组织各校师生开展“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同年九月，他在四川教职员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说：“吾川国家税收每年不下三千余万元，而教育经费六十万元却无款开支，以此欺诈国人，万万不能承认，如再能忍受下去，吾人人格安在！”一九二二年三月一日，成都教职员联合召开紧急会议，要求财政厅补发欠薪。四月一日，重庆男女学生为教育经费独立游街宣传，父亲领导青年团和读书会推动各校开展了规模较大的一次独立运动。他首先在高师附中召集各校青年团负责人开会，提出以划拨全川肉税为教育经费是这次运动的目的。父亲要求大家遵守纪律，社会主义青年团派纠察队维持秩序。四川学生联合会也全力支持。在教职员和学生代表大会上，父亲被推选为运动的总指挥。

一九二二年六月五日，教职员和学生联合会决定各学校一律罢课。六月十日，举行示威游行活动。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表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宣言》号召各校教职员和学生紧急行动起来，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六月十二日，我父亲率领代表团到省议会请愿，省议会议长熊焯（又名晓岩）拒不到场，引起师生极大的忿慨，派了八名代表到熊焯的住宅去要求其到会，熊焯命家丁抓了这几名代表，在省议会旁听的几百名学生代表和教职员闻讯，由父亲率领，直奔熊宅质问，救出代表，熊狼狈逃窜。六月十三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读书会又组织一千多名学生到省议会请愿，熊焯支使暴徒手持棍棒、铁器、石头殴打

~ 4 ~

学生，打伤三十余人。父亲一方面安抚受伤学生家属，积极设法治疗受伤者，一面继续作组织动员工作。

熊焯为了达到镇压教育经费独立运动的目的，到处张贴传单，诬蔑父亲“以马克思主义麻痹青年”、“专和政府捣乱”、“妄图实现个人阴谋”，要求政府逮捕王右木。父亲立即在高师附中召集教职员和学生代表紧急会议，动员大家坚持斗争。重庆教职员联合会为配合，支持成都的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召开全体会议，于六月二十日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六月二十一日重庆各学校罢课，省议会迫于形势，终于通过师生代表提出的议案。然而他们无理解聘了父亲在高师的职务。但从此，成都马列主义信徒、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这一壮举在川传为佳话。

一九二二年七月，父亲被解聘后，离开成都到上海，住贝勒路法租界鸿仪里寓所2号，到党中央所在地渔阳里接洽。李达、恽代英等同志曾和父亲会晤，住了月余，父亲患了严重的脚湿病。夏末，父亲带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回到成都，新任高师校长吴玉章聘请他作高师附中教务主任。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方针。九月，父亲去上海，又到广州接受了党的指示，返川后，传达了这一指示，他带头执行党中央的决议，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国民党四川文部聘请他任宣传科

副科长。一九二三年秋，父亲执行党中央关于同意在四川建立中共支部的指示，他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选拔了一批斗争中的优秀份子，秘密组成中共四川支部，他任书记，下面分三个小组。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日，“四川民权运动大同盟”在成都东大街一处寓所召开改组代表会议，陈毅（仲宏）同志任会议文书职务，选了我父亲和裴紫珺为文书股主任；康明惠、钟善辅为庶务主任；钟协安、孟本斋为交际股主任；刘亚雄、罗荣为宣传股主任，推选钟协安为联席会议主席，刘亚雄为副主席。

一九二四年杨森占领成都后，北京军阀政府委任杨为四川督理，杨森为收买人心，提出“建设新四川”的口号，经督署秘书秦正树办报纸为其呐喊。秦正树在日本留学时与我父亲有学友之谊，回国返川后，也加入了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受命后，即向我父亲谈了此事，父亲就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骨干会研究，决定把报纸办起来。因当年是甲子年，就以《甲子日刊》为刊名，社址在成都三倒拐街（原川汉铁路旧址），秦正树任社长，父亲任总编辑，刘愿安被邀为编辑，刘亚雄、钟善辅为助理编辑。报纸宣传的方向是利用杨森“建设新四川”的口号，宣传反对防区制，反对军阀混战，主张还政于民，有时也宣传马列主义，颂扬苏联的革命，介绍社会主义制度。后来杨森迫令停刊。

杨森深知我父亲在成都工人、学生中的威望，想用高官厚禄收买

他。一九二四年三月下旬的一个上午，杨森派了四个亲随副官直到我家，呈上一张杨森军部督办署顾问的委任状，并放了一包银元在桌子上，对父亲说：“杨督理久仰大名，请出来襄理川是。”父亲严辞拒绝，决定暂时离蓉以逃避此事，当天下午就离开家，到晚方回，于深夜时，父亲收拾了一些换洗衣服和用品，打了一尺多长一个包袱，辞别母亲出门。我送他到九眼桥时父女才分手，他买了一乘轿子把我送回家。父亲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父亲离蓉后，顺利到达上海，不久又去广州，在广州参加了党的重要会议。会议结束后因工作需要，绕道贵州返川，途经贵州赤水土坝时，父亲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说回来过中秋节，可是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到他的面。这是一九二四年秋天，当时，我在省立第一女子师范读书，家中有二弟、妹妹和妈妈。父亲走后，妈妈又生下她的遗腹子——我的小弟弟。大弟于一九二二年害疟疾死去，全家五口人，生活极困难，经济上全靠父亲的同事和学生凑钱接济。我还到南府街八号高师教务孙有余处去收过欠薪，跑了若干趟，收的钱不足一百元。家中经常遭到军警的查问，三年内，我们搬了几处，先后在宾升街、皮房后街、泡桐树街住过。

一九二六年我毕业那学期，学校开运动会，我没钱制运动服，就写信给傅子东伯伯（江油人）求援，傅当时在高师任校长，有个名叫卿云鹤的学生，也是马列主义读书会成员，先前我父亲教过他，他常

到我家来。那天他看到传达室有傅子东的信，从地址上知道是我家写来的，信口又未封，他就取出来看了。于是他到我家里来对我妈说：“王师母，王菊（我的曾用名）没钱制运动服，我家刚给我兑了钱，我借五元给她，等王老师回来了还。”不久，卿云鹤又借给我们四十元，当时若说支援，我妈不会接受。卿云鹤一九二七年毕业于成都高师体育系，去南京考察教育回来，在成都教书，当时我们已有一定感情，同志们见我家没有“五尺应门之童”劝我们结婚。一九二七年秋我们结婚，我年龄才十六岁。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时局一天天紧张起来。同志们劝我家转移，于是母亲带着弟妹们回到老家，我同老卿回他家岳池县黎梓村。一九二八年旧历六月，我正在产期，突然收到一封署名“共产党重庆留守办事处”的来信，说“王松英同志，你父亲在重庆监狱被石灰包塌下压死了”。这对我不管晴天霹雳！我哭了几天，吃不下喝不下，得了气病，一呕气就生病。后来我问了很多同志，都说当时重庆没有这个机构。

从此，我在广安、岳池、三台、射洪、遂宁、泸州、渠县、南充等地教书渡日。一九三〇年在射洪教书时，我回江油武都看望亲人，小弟在一九二八年就死了；二弟王浴生在救济院学石刻；妈妈和妹妹在伯父家中干活，伯父管她们吃，医药和穿的靠我教书挣钱，省下的不定期地接济她们。当我看到二弟面黄肌瘦的样子，对比他在成都时

那天真活泼的可爱象，不禁大哭一场。我在外偶尔收到妈妈的信，她说：“你念在母女的情分上，给我兑点钱来”，我就伤心落泪；我咋会不念母女之情呢？

妹妹十四岁在江油中学毕业，考上成都区职业学校（公费），一九四五年毕业分配到重庆沙磁医院。二弟王浴生在一九三五年到南京由大哥王大德（伯父之子）资助读高中，一九三七年到达延安。我在丈夫家由于没有给卿家生儿子，关系处得不好，我大部份时间都在外教书。弟妹一走，一九四四年我就把母亲接到岳池与我同住。抗日战争胜利后，卿云鹤由教书转为做生意，他从岳池零梓镇买米运到重庆卖，赚钱后，在岳池买了几十亩田，从此，他成天打算盘赚钱，我接母亲来，他家有意见，我俩关系日益淡漠，我就皈依佛教为居士。从此，我和老卿分了手。一九五一年土改时，老卿跑到泸州他妹夫、妹妹那儿，妹夫办书店，老卿就任经理，家里老卿的妈妈被划为地主。

父亲失踪后，我把他的信件、资料、书籍等装在一个箱子里。我不论走到那儿，都要把它带上。一九四九年四月，妈妈提出要回老家。我说：“你要回去也应到妹妹那儿去看一下。”她在五月份到达重庆，我于八月底也去看望她们。刚拢时，我住在重庆陕西街老卿的熟人王裕祥旅馆一个单房间里，父亲的那口箱子就放在房间。九月二号，我穿了一件白帆布衬衫，提了个小包到临江门医院找妹妹王大容。在妹妹那儿耍了一会儿，就听有人在喊：“起火了！街上起了火！”我们

跑到坡上去看，全城许多处都燃烧起来。我嚷着要去陕西街拿行李，妹妹把我拉住，别人也说：“你不要命啦！”我只好眼睁睁看着大火熊熊燃烧。江面上浮着汽油桶，油浮在水面上燃烧，油桶与下游的船相撞，船也烧起来，简直是一片火海。人们惊慌失措，四处逃难。火警们用水龙头救火，可水一放，火反而大了，人们说他们放的是汽油。有的人被烧得乌焦，有的全家死完。那些大银行、大字号的公子、小姐们，九月二号早晨出外逛街，火一烧，什么也没有了。许多人无家可归，其惨状难以形容。这场大火灾烧了几天几夜，我父亲那箱珍贵的文物也倾囊在旅馆里了。这是我生平最对不起父亲的事。

“九·二”火灾后，我同母亲回江油老家。长途汽车经遂宁，我严重晕车，无法继续乘车，就暂住遂宁治病。经与我看病那位医生深谈，方知他是我妹的老师。我病愈同母亲回到老家，看到家里冷清阴湿，乱七八糟，心里很难受。我母女二人另起炉灶，待家安好后，就写信叫妹妹回来。妹妹于一九四九年冬月启程，到遂宁时看望老师，老师留她在遂宁工作了几个月，于次年春回来。初回来时在江油师范教生理卫生，一九五四年在我家铺面开设《妇婴诊所》，不久县医院要他工作，她一九五五年停业，带上所有医疗器械参加县医院工作。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被迫害致死，当时我们瞒着母亲，只说妹妹到成都治病去了。遂送母亲到浙江（因我弟弟在浙江师范学院工作）母亲一九六三年在浙江去世，我到浙江接她的骨灰盒是由县府开支路费。

现在接着讲我刚回来的情况。我从回家后，天天都盼着能见到父亲，希望他突然回到家里来。走到街上，仿佛有父亲的身影，尤其是看见酷似父亲那高大身材的人的背影，真想喊出声来。有一天，我在家里推碾子，有个人来找我，这人我只见过，但不知姓名，他说他姓蹇，叫我出去一下，他有话说。我想，人们称的“蹇三老爷”蹇仿樵就是他吧？现在要解放了，你找我有啥好说的呢？无非是造谣煽动，要我们跟你跑。我就对他说我不出去，我们回来就是来迎接解放。来找我父亲的，他就真趣地走了。

当时，我们还不知二弟王浴生的消息，听县政府说我二弟要从河南回来了，母亲和我高兴得很。解放时妈妈六十多岁，我也三十八岁，都盼望全家早些团圆。一九四九年冬月初三江油解放，妈妈叫我去快去找爸爸和弟弟。我走到街上，看见很多解放军，他们排着队伍唱着歌，我原以为一问就会知道他们的消息，殊不知问了几处，都说不知道，回去后母亲很失望，又叫我去找，有一位解放军看我东张西望很着急的样子，问我找谁，我说出弟弟的名字，他就跟我来到家里。一进门他就把我妈叫妈妈，喊得很亲热，母亲拉住他的手，把眼睛都哭得充了血。

春节过后，林宗华县长和张秀熟同志看望我们，给我们送来了烈士证和花圈，政府发给我们一千二百斤抚恤粮，我才相信父亲真的牺牲了。想到父亲为人民牺牲，他的死，换得了人民的解放，也是莫大

的安慰。

有一次，林宗华县长、冯壁和部长来慰问我们。林县长叫我教书。我说我在旧社会吃了几十年粉笔灰，不想教书。林县长说：“那你总得劳动呀！”我说我愿纺纱。一九五〇年我参加佛教贫民习艺所，趁学纺纱。一九五三年习艺所并入新民纺织厂，我入了工会。一九五一年，我出席了川北区妇女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见到胡耀邦同志。

自己想到是烈士后代，不是党员也应象党员一样工作，为社会多做好事。民众教育馆要我教夜校，我乐意地承担下来，从不缺课，许多工友我都教过他们认字、算术。逢年过节，政府和部队请我们赴宴，生活过得很有意思。一九五五年，我在中坝讲过父亲的革命事迹。冯介伯老师把它整理成材料，由欧小白馆长在文化馆登载过。

一九五四年普选时，三榜发下都没有我的名字，我背了思想包袱，气得害了一场病。当时派出所所长肖继顺同志找我谈话，对我进行解释和安慰。他说组织上是了解你的，主要是你丈夫家是地主。我又想，只要没把我当地主份子看待，我还是想得通。接着是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七年我被勒令下农村，指定在阳亭公社十二大队落户。我去挂钩时还生怕别人不要我，怕别人嫌我年老体胖不能干活，直说自己如何能干。我这样作也是想一心服从共产党的政策法令。在农村，有时做梦还梦到见毛主席。在农村十三年，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现在不说了。一九八〇年，党给我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名誉，使我能愉快渡

过晚年。生活上，政府每月补助二十元，我老有所终。现在我的亲属还有女儿、女婿，他们在蓬安丝厂；弟弟在浙江已离休；侄儿王国成在江油城郊中学工作。

江油县政协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整 理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江油六合埝水利工程概况

六合埝是我县自流灌溉的较大埝渠。其进水闸门在三合乡老河口（现柏至大队第一生产队境内），主埝直达松林桥溢入涪江，全长十五公里。其干渠与分渠共有七条，支渠无法数计。地理位置东靠白鹤嘴、火峰山、高泉山、大东岳山与松林坡，西临中坝涪江，象一片巨型杨树叶的脉胳纵横三合乡全境。

六合埝始建于明末清初（1644年左右），因早年的乡民迷信神道，以此埝工程浩大艰巨，非人力所能开挖，遂用古代神话中道士的斋讳作为埝名，称“洞宾埝”、“盖寓埝”。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以此埝进水后分小中、夹马、磴窝、永丰、新渠、真阳六大分埝，更名“六合埝”，仍从现在的闸门处，用竹笼装人头石拦涪江之水入渠。没有节制流量等各项设施，故每遇洪水便要疏浚。每年洪水凡涨几落，便要进行几次淘挖，且常因埝底淤积泥沙，进水量减少，影响受水面积。尾埝、中埝常常因抢栽季节缺水，不能按时插秧而造成减产，有的农民因争先放水而发生斗殴。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秋，涪江流域一带发生特大洪灾，该埝进水渠为沙石淤塞，两旁埝埂被洪水荡平，直接威胁到三合乡二万余亩良田的灌溉。后来得省府水利贷款、贷粮，于同年底开工复修，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七月竣工。为时一年零九个月，建成上有三间闸房的进水闸门一座，下有水门六孔，两端两孔用扎板杠

杆启闭，中间四孔用螺旋轮启闭，以节制流量。其进水最大流量为每秒八点四万，全年实际进水总量为一亿八千三百余万方，可自流灌溉二万一千四百三十三市亩。另建有防洪堤一道，长六百三十九米，拦河坝一道长一百四十八米，还有节制闸、分水闸及涵洞各一座。自此，六合埝除每年疏淘沟渠之泥沙外，从无毁损，直至现在可畅流无阻。

始建六合埝修筑工程所需人力无志记载，亦无传闻。民国三十四年的修筑工程共用技工与民工六万余工。民工是当地保甲长接受水面积进行摊派。大体是每耕种水田一亩者由佃户出工二至三个。每工每天只给大米三斤半，以二斤半作为口粮，一斤米的价款作为盐付食，余无补贴。其粮款来沅除政府借贷外，部份资金按受水面积分摊。即每亩摊派法币壹千三百元，算在粮价上，仍由佃户承担。

在修筑工程中，劳动人民冒寒暑，斗风雪，冬天在冰冻的渠道里淘挖泥沙，夏天在火热的沙滩上堆砌堤埂，直至工程告竣。所以，六合埝之有今日，完全是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

历代统治者总要利用一切机会对劳动人民进行强取豪夺。民国三十四年秋洪之后，彰明县六合埝水利协会会长杨少铭、副会长何蓝田，应群众要求，提出修复埝口之议，得到彰明县参议会议长梅尔冀（仲春）、副议长杨笃生的支持。县长刘光乾便乘机插手，向省府贷得水利款法币六千五百万元，黄谷六千市石。刘得款、粮后，便拖延开工期限，将政府贷款与贷谷变价存放于中坝巨商《永兴昌》大老闆李平

修处。得八分大利（即一百元每月八元利息），刘得息纳入私囊。李利用此款大搞屯积，双方得利。这时正值抗日后期，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政府所贷款，粮虽有其数，但其值已不偿实。至民国三十五年夏，款尽而工未竣，又通过县田粮处处长贺季雅借得积谷四千市石。议定每亩受水田分摊黄谷八个老斗（每老斗黄谷约合现衡制三十市斤）民国三十六年计入秋征一并归还。

这时正值国民党实行“二五减租”，加之田赋连年征、借积累数量较大，使受水田田主感到负担较重，若将各项借谷、积谷加在一起，不但当年无收，还要倒欠。这时彰明有个杨宝成的田主，在灌区内有水田一百余亩，他联络了在灌区有水田且有声望的田主彰明徐明泰、中坝王信之、韩子寿、王昌炽、朱朗泰、朱钦如、唐厚安、唐克诚、韩光烈、徐绍臣等人，在中坝《临江艇茶园》聚首会商。据杨宝成谈出六合埝摊派之摊水谷分客籍与土住，重点放在客籍身上。即江油籍人有受水田归六合埝者，所摊摊水谷加倍，从而激起了江油籍田主的反对。（彰明籍田主亦可藉此得利）。后来大家推出代表杨宝成、徐明泰、韩子寿、唐厚安等十余人，组成请愿团，于民国三十六年正月十五彰明花会期间到县府请愿。

但请愿风声很快透露，当请愿团到达彰明县城时，县府戒备森严。刘光乾县长拒不出面，请愿团在大堂口守候半小时许，刘才在收发室接待（不在会客室召见是官场上对来宾的鄙视），经请愿团再三据理